

有些東西不能賣？

近來城市熱話之一，大概要數領匯的「尋味時光」事件。事緣領匯近日推出「尋味時光」活動，以推廣旗下商場老字號食店，結果引起網民強烈反彈，集體杯葛與聲討領匯。所謂「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」，市民之所以對「尋味時光」這麼大反應，大概是因為2004年自香港政府將公共屋邨商場及停車場售予領匯，把公共服務私有化以來，不斷有小商戶（自然包括老字號食店）因為加租而陸續閉門，公屋居民的日常生活亦因為領匯轉向高檔化經營而大受影響。

文：小西

其實，對於公共資產／服務應否私有化的問題，早在香港政府決定出售公共屋邨商場及停車場時已有爭論，到領匯宣佈上市，箇中論爭就更是白熱化，領匯的投資者認為領匯上市實屬自由市場的買賣，以法律途徑阻止領匯上市，一方面有損領匯投資者的利益，另一方面則影響香港向來的自由市場的基石；反對者則認為公共屋邨商場及停車場屬公共資產，不能也不該變賣，私有化將嚴重損害廣大草根市民的根本利益。

或許，更根本的問題是：在這個自由市場當道的世界中，是不是什麼東西都可以進行買賣？還是，市場並不是也不該無遠弗屆，市場有其道德底線，有些東西壓根兒不能賣？這正是知名美國當代哲學家邁可·桑德爾（Michael J. Sandel）在其新著《有什麼不能買？：市場的道德底線》（What Money Can't Buy-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）中，所提的一個最根本也最尖銳的問題。

放任市場的世界

桑德爾是美國哈佛大學的著名教授，自1980年以來，一直講授一門以「正義」為主題的倫理學課，並大受歡迎，歷久不衰。2009年，桑德爾更決定把這門課向全球公開，一方面把教學內容撰寫成書，另一方面則把上課實況剪輯成十二個鐘頭的節目，在美國公共電視播放。結果，該輯節目在電視頻道上瞬即走紅，在網絡瘋傳，結集成書的《正義：一場思辨之旅》（Justice: What's The Right Thing To Do）就更是洛陽紙貴，成為了罕有的哲學暢銷書。早前，甚至連城市電訊主席王維基，也把該書形容為「啟蒙之書」，可見其流行的程度。

跟《正義：一場思辨之旅》相似，在新著《有什麼不能買？：市場的道德底線》中，桑德爾擅於從有趣的故事與情境出發，然而深入淺出，以簡明的文字，對一個又一個有關市場的道德問題，作出鞭辟入裡的層層論證。

正如桑德爾所指出，全面市場化是冷戰結束以來的全球現象，其市場化的透徹程度，有時已達至匪夷所思的地步。例如，在美國加州聖安娜市（Santa Ana）的監獄，只要你不是犯有暴力罪行的刑事犯，你可以要求轉往乾淨清寧的牢房，「昇級費」每晚盛惠美金八十二大元。又例如，南非政府最近開始容許牧場主提供有限量的瀕臨絕種黑色犀牛，供人付費射殺（代價為十五萬美元），旨在鼓勵牧場主飼養與保護瀕臨絕種的動物。又例如，有人專門向病人或老人家收購人壽保險，他們在對方生前負責支付所有保費，對方死後，則自然成為保險賠償的受益人。在《有什麼不能買？：市場的道德底線》一書，桑德爾還列舉了大量的同類例子，愈往下讀下去，愈覺匪夷所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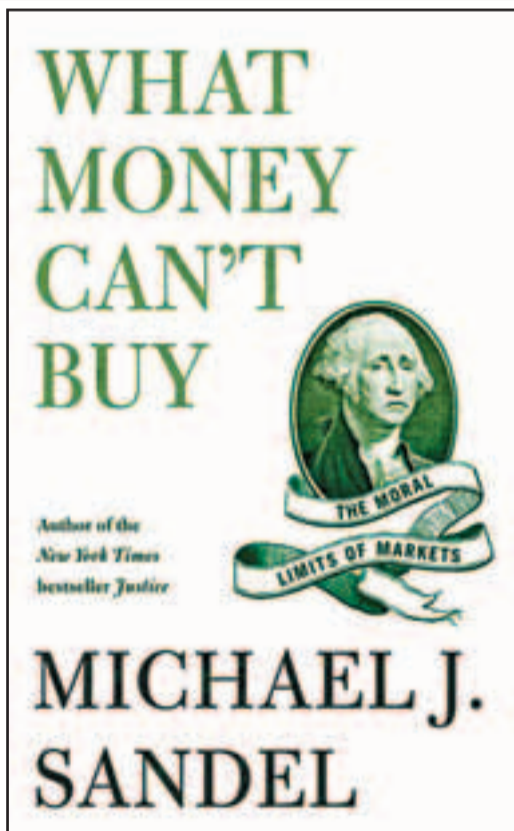
自由市場的道德界限

固然，全面市場化是九十年代以來的全球大勢，但作為倫理學的桑德爾，他更關心的問題是：這樣對嗎？桑德爾指出，對全面市場化持反對意見者，主要有二：（一）若果所有東西都轉換為可買可賣的商品，會導致社會上整體的「不公平」（Inequality）現象。當然，像遊艇、跑車等高檔次商品，只供富人獨享，並不會導致資源的不公平，因為那些物品或服務都不是生活必需品。然而，若果金錢愈來愈無所不能，你可以透過金錢購買政治上的影響力、優質的醫療服務、四周治安良好的居所、優良的學習環境，收入與財富的分佈會變得愈來愈不平均，貧者愈貧，富者愈富。（二）有反對者則認為，「凡事有個價錢」讓某些美善的東西變質。因為市場不單依靠財力分配物品或服務，它也宣揚了一種特定的價值觀。桑德爾舉例說，家長以金錢為餌，短期內固然能夠誘使孩子們讀上更多的課外書，但與此同時，卻扭曲了孩子們該有的閱讀態度：把閱讀視為一種生財工具，而非一種有益於生命、讓人自得其樂的嗜好。簡言之，全面市場化「腐蝕」（Corrupt）了某些道德上的基本價值。因此，自由市場必須有其道德界限。

回頭再看領匯上市的例子。或許，站在桑德爾的立場，問題的關鍵似乎不再是「少數人的利益VS.大多數人的利益」，而是公共服務私有化所帶來的道德價值上的扭曲與敗壞（Corruption）。毫無疑問，對於桑德爾來說，這世界有些東西不能賣。



邁可·桑德爾



N城記：上海北京 禁忌之舞

作家虹影與上海的緣分，要追溯到1989年。當時她從魯迅文學院畢業，按照計劃，他們一批青年作家應該要進北大，但北大已經被停課了。大家都聽說，江澤民這個人非常好，或許可以去上海碰碰運氣，於是他們一行人坐火車南下，到了上海。彼時的復旦大學，氣氛還算正常，比起北京來，完全是另一種天地。復旦中文系的老師對他們說，歡迎歡迎，你們不必考試，系主任報告校長，校長從上海市教育局要了幾個名額，來安置這些北方的棄兒們。因此，在4月19日的演講中，虹影說：復旦是我的避難所。

和大多數八十年代的文學青年一樣，虹影最早是以寫詩出道。在她漫長的作品年表上，她的處女作，是1983年2月發表在《重慶工人作品選》的《組詩》。八十年代初期，朦朧詩的北島、顧城已經「過時」，虹影和一批後朦朧詩的詩人，張棗、宋焯他們，一起走在重慶街頭，做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：散發「存在主義」的傳單，口耳相傳，在公園舉行詩歌晚會。晚會上人人山人海，三洋錄音機裡放着鄧麗君的音樂，人人都朗誦詩歌，熱情膨脹到了極點，直到被警察驅散。那些年，詩歌改變了虹影的人生道路，似乎也改變了政府主義控制的狀態，然後就到了1989年。

1989年的復旦還有一個好處，就是沒人管你不上課（或許直到現在也是如此，這所學校私下流傳的校訓是——自由而無用）。在插班讀書的兩年裡，虹影做的是別的功課，她走訪上海各處的弄堂、老房子，採訪裡頭的居民，收集材料，尤其喜歡上海灘黑幫的故事，後來她以此寫出了暢銷小說集「上海三部曲」。1991年，大學畢業以後，她面臨著兩個選擇——去英國或者是美國，「這取決於我會選擇哪個男人」，虹影如是說。

事實是她選擇了去英國倫敦大學教書的趙毅衡。初到英國，語言不通，實在無事可做，又不能真的像黛黛雲建議的那樣，開個花店；虹影決定開始寫小說。她先是寫了一本自傳體式的小說，一個關於動盪的夏天，在政治和性裡迷失的年輕人的故事，這就是直到現在也不能在內地出版的《背叛之夏》。1997年，她出版了另一部驚世駭俗的自傳體小說《飢餓的女兒》。這部小說以文革為背景，寫一個女孩如何發現自己是私生女的身世，也揭露了文革大饑荒的秘密。

小說先在台灣出版，拿遍了台灣各種獎項，得到非常高的評價。陳思和曾評論，在中國，寫文革寫得最好的，就是《飢餓的女兒》。在演講中，亦有聽眾詢問虹影，你是如何定義飢餓？虹影說，飢餓是我的胎教。一個飢餓的人和溫飽無憂的人是不一樣的。飢餓會產生很多的慾望。開發出你大腦裡未開發的區域。會讓人有特殊的靈敏和緊張。這是一種害怕餓死的狀態，一種求生的本能。溫飽的人安於現狀，不會做多大的努力。如果生活把你逼上絕境，你就會採取行動。

虹影就是這樣一個矛盾的作家，她寫文革、饑荒、學運，也寫性愛和女性的身體感受，她信詩人鍾愛的所有強烈的、挑戰禁忌的東西，可她也信一些有的沒的，命運和鬼神之說。她說，我們從小都不愛去醫院，靠草藥和巫婆跳舞唱歌，我們相信死人和靈魂，重慶江邊有很多觀音小廟，裡頭有中國最古老的道教的刻出來的神像。馬爾奎斯寫，一個人死了，血就會流回去，就報告家裡人，這種技巧對我來說，完全就在血液裡，不需要模仿。



要刊書事

圖、文：Cate

The Guardian 《衛報》 11/05

在新書的書腰上，印上知名作家或評論人的評價，似乎早已成為一種心照不宣的促銷手段。這些引語或者名句，英文裡叫blurbs，通常都是用一種誇大其詞的寫法，對所評價的作品表示作者過分的推崇。作家Anthony Horowitz在Who's helping who in the cover blurb game?一文中，就談到了這種blurb business背後的實情。其實，在很多情況下，出版社只是有選擇的對某篇書評進行編輯，讓它讀起來顯得更有說服力，甚至不惜張冠李戴。Horowitz自己就曾遭遇被莫名其妙的安排到某本書的腰封上，他卻從來沒讀過這本書。作家懷疑，到底有多少讀者，會真的受到blurbs而去買書？



The New Yorker 《紐約客》 21/05

要真正搞明白英文語言的奧妙顯然是徒勞的。不少語言學家都在努力讓那些太過隨意的英文有理由可依，但是，結果都不盡如人意。有關語言的爭論，最近一次是由語言學家Henry Hitching的新作The Language Wars: A History of Proper English開始。在書中，作者認為，對英語語言過於規範化，會導致教育的錯誤導向，甚至會對一些俚語產生歧視。反倒是1926年出版，由H.W. Fowler所著的A Dictionary of Modern English Usage，則以改善農村人口語法標準為目標。



TIME 《時代周刊》 14/05

在現在的出版界，北歐文學正橫掃一切。比如懸疑和偵探類的代表人物Stieg Larsson, Henning Mankell等人，一直佔據暢銷榜前幾位。其中，挪威小說家Karl Ove Knausgaard的作品，顯得別具一格。儘管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充滿爭議性，但在歐洲市場仍佔據主流。A Death in the Family是作家6本自傳小說系列的第一本。作家採用小說的寫法，但從人名到地名，全部來自作家的生活裡。小說中真正的主角是作家的記憶，在回憶中，每一件小事都別具深意。高潮部分，是作家和弟弟去酗酒父親家清掃房間，那時父親已在生命的最後時期。巨大的末日感和空虛感，向讀者撲來。據說，此書出版後，引起作家父親家族不滿。



The New York Times 《紐約時報》 11/05

母親節上週剛過，出版界關於母親的話題依然沒有停止。從去年熱賣的《虎媽》到今年攀升的法國人為母之道，有越來越多的母親開始承認，為人母的快樂，只佔養育過程中的百分之五。而百分之九十五的煩心，就需要靠閱讀來緩解。愛爾蘭作家Anne Enright在2004年，出版自傳Making Babies，再度熱銷。作家媽媽是在孩子的睡覺間隙中，完成此書。從餵奶、到孩子的啼哭到打瞌睡，描述了從懷孕到哺乳最黑暗的階段，作家是如何度過。不過，在書的結尾，她對女兒說道，「有的時候，對着女兒說這些，好像產生一種懷舊的感覺。」

